



中國崛起對美日、美韓、與「美台」

同盟關係的影響與挑戰：

從經濟到安全「雙重依賴轉移」邏輯的分析視野

陳亮智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中國崛起對美國亞洲盟邦以及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軍事同盟的影響邏輯為何？本文認為北京主要是利用其經濟上的優勢，依循著「先經濟後安全」的發展軌跡逐步地促成華盛頓的亞洲同盟伙伴對其先產生經濟依賴的轉移，再產生安全依賴的轉移，進而形成所謂之「雙重依賴轉移」，如此以削弱、裂解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軍事同盟對其崛起所形成的箝制。然而此影響邏輯未必對每一個美國亞洲盟邦造成相同的影響與結果，在美國的三個東北亞同盟國家當中，基本上日本與南韓是呈現「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的「分裂式依賴」；而台灣極可能會是「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也依賴中國」的「匯聚式依賴」。為了因應此影響邏輯的作用，華盛頓此刻也正在調整它對此三個同盟伙伴的態度。

關鍵詞：中國崛起、軍事同盟、雙重依賴轉移、分裂式依賴、匯聚式依賴



The Influence and Challenge of China's Rise to the U.S.-Japan, U.S.-Korea, and "U.S.-Taiwan" Alliances: The Logic of "Dual Transition of Dependence" from Economy to Security

Liang-chih Evans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at is the logic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rise in America's Asian allies and their mutual defense frameworks with Washington? In this research paper I propose an idea of "dual transition of dependence" arguing that Beijing is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economic upper hand to place leverage on Washington's allies in Asia to lead to their dependence on China, from economy to security. In doing so, Beijing will be able to weaken or break down the check and balance against its growth, which is generated by Washington and its Asian allies. The logic of the "dual transition of dependence" model, however, does not work similarly on each America's Asian allies. The cases of Japan and Korea appear to be a pattern of "divergent dependence" implying both of two states depend on China economically but rely on the U.S. militarily. In contrast, the example of "Taiwan" is very likely to be an opposite one of "convergent dependence" meaning the country depends on China economically and will rely on China militarily. In response to this transformation impacted by the "dual



transition of dependence” model, Washington is readjusting its attitudes to these three America’s allies in the region.

Keywords: China’s rise, military alliance, dual transition of dependence, divergent dependence, convergent dependence



壹、前言

在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實踐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即是華盛頓要加強它與在此區域之同盟國（allies）的軍事同盟關係以鞏固美國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的領導地位（leadership），並藉此以促進此區域的和平與穩定。¹ 而一般也認為，美國重返亞洲並且強化與同盟國的軍事合作關係乃是因應中國的崛起（China's rise）以及北京積極尋求突破第一島鏈的企圖，² 也因此從去年（2010年）夏天開始，美國遂與其同盟國在此區域進行了一系列的聯合軍事演習，而在東北亞地區則首重美日與美韓兩個同盟關係的鞏固與強化。³

¹ 有關美國「重返亞洲」之政策宣示的文件，請參照：*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Suntory Hall: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suntory-hall>, Remarks on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9/146917.htm>, First Plenary S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Visions of Global Order: <http://www.state.gov/s/d/2010/147003.htm> (檢索日期 2011 年 3 月 21 日), and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2010* (Washington, D.C., May 2010), pp. 41-43.*

² Mark Landler, "Offering to Aid Talks, U.S. Challenges China on Disputed Island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0; Mark Landler and Sewell Chan, "Taking Harder Stance Toward China, Obama Lines Up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10.

³ 此一系列的聯合軍事演習包括：首先是共有來自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加拿大、與澳洲等十四個國家約兩萬名官兵參與演練的「環太平洋演習」；其次是在新加坡水域舉行「聯合海上戰備和訓練演習」；接著是七月上旬美國與南韓進行「反潛艇演習」（原先傳聞美國海軍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將進入黃海，後來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而移至日本海舉行）。八月上旬，美國與其前交戰國家越南首次於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八月中旬，美國與南韓再進行第二次聯合軍事演習，其規模是繼南韓海軍天安艦於三月被擊沈後最大的一次；八月下旬，日本媒體報導美國與日本計畫將在十二月份於釣魚台列島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後來因為北韓於十一月下旬向南韓延坪島進行砲擊，華盛頓與首爾於是展開另一波的聯合軍事演習（11月28日至12月1日），而華盛頓與東京接續其後舉行雙方歷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12月3日至12月10日），而同一時間（12月6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與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及南韓外長金星煥則在華盛頓舉行會談共商因應北韓的威脅。參照：「亞太軍演環繞中國周邊舉行，美專家：防備中國等新興勢力崛起」，*中國時報*，2010年7月5日與*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and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Kim Sung-hwan: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2/152443.htm> and Trilateral Statement Japan,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雖說此一系列的聯合軍事演習反映了美國藉由強化與其亞洲盟邦的軍事同盟關係用以回應中國崛起所可能造成的區域安全威脅，但是究竟中國在經濟快速成長、軍事大幅現代化、以及國際政治與外交影響力與日遽增的同時，它對美國之亞洲盟邦的影響邏輯為何？它對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軍事同盟關係的戰略目標與利益為何？以及它對由美國所主導之東亞秩序的挑戰與影響又為何？此三個問題乃構成本文最主要的關懷意識。基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理論當中「經濟相互依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經濟外溢效果」(economic spill-over effect)與「議題連結」(issue-linkage)的觀點，本文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的亞洲盟邦，對美國與亞洲盟邦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及對由美國所主導之東亞秩序的影響邏輯乃是依循「先經濟後安全」的發展軌跡逐步藉由它的經濟成長與廣大市場而拉攏(或吸納)華盛頓的亞洲同盟伙伴，進一步地促其產生「經濟依賴轉移」(transition of economic dependence，即由對美國的經濟依賴轉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再導引至「安全依賴轉移」(transition of security dependence，即由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轉向對中國的安全依賴)的「雙重依賴轉移」(dual transition of dependence)。在如此兩重依賴關係的轉移之下，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將因此產生質變，進而被削弱與裂解，而美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以及東亞地區既有的區域秩序也將因此受到中國崛起嚴厲的挑戰。

固然中國崛起對美國的亞洲盟友以及它們之間軍事同盟關係的影響邏輯乃是沿著「先經濟後安全」的「雙重依賴轉移」而產生作用，但是本文也必須強調此一影響模式未必在每一個美國的亞洲盟友身上發揮作用，或該影響模式確實發揮了作用，但其效果卻因個別國家的不同應對而有程度上的差別。換言之，並非每一個美國的亞洲盟邦都對中國崛起產生相同的反應(或相同的依賴轉移)；亦非每一個美國與其亞洲盟友的軍事同盟都承受中國崛起所帶來相同程度的衝擊。而這樣的差別現象則是在美國的三個東北亞同盟國家當中(日本、南韓、與「台灣」)明顯呈現出來—基本上，「美台同盟」所呈現的是被中國崛起現象所削弱與裂解；而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則因中國崛起現象而



獲得修好與補強。⁴ 整體而言，台灣極有可能是受到中國崛起所帶動之先經濟後安全之「雙重依賴轉移」的作用與影響最為深遠的國家。若台灣海峽兩邊的交流與整合是順著「先易後難」以及「先經濟後政治與安全」的進程而向前，而執政的國民黨政府與對岸也的確在馬英九總統的第一任任期內完成建置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與整合架構，並且在其第二任任期內（假定馬總統順利連任）完成兩岸和平協議的簽訂與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則台灣將繼從「對美國的經濟依賴」轉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之後，形成新一波的從「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轉向「對中國的安全依賴」；兩岸新階段的政治與軍事安全之合作及整合將徹底呼應中國崛起的「雙重依賴轉移」之影響邏輯。相較於台灣，日本與南韓則是受到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作用與影響較為不完全的國家，其原因乃是雖然於 2004 至 2007 年間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日本與南韓的最大進口國家，同時也是最大出口國家，但是 2010 年以來美日與美韓同盟關係的再強化正說明了：東京與首爾雖然出現了從「對美國的經濟依賴」轉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是兩者並未因此而出現從「對美國的安全依賴」轉向「對中國的安全依賴」。換言之，日、韓兩國乃是在經濟上依賴中國，但是在安全上則是繼續依賴美國。

基於以上的邏輯演繹與現象觀察，本文依序發展如下：首先闡述說明中國崛起對美國亞洲同盟所造成「先經濟後安全」之「雙重依賴轉移」的影響邏輯。其次觀察日本、南韓、與「台灣」此三個美國在東北亞的盟邦如何回應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的作用與影響。最後結論乃是根據此三個美國盟邦對中國崛起所做出之不同的回應進行評估美國可能的因應之道。

⁴ 雖然台灣與美國之間並無如同美國與日本（基於「美日共同合作與安全條約」之簽訂而建立起「美日同盟」）以及美國與韓國（基於「美韓共同防衛條約」之簽訂而建立起「美韓同盟」）之間正式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而建立起軍事同盟關係，但是一般多認為美國與台灣乃是「事實上的同盟關係」（*de facto alliance relationship*），因為根據美國的台灣關係法（*The Taiwan Relations Act*），美國對台灣的有安全防衛上的正式承諾。參照：John J. Tkacik, Jr., “The U.S.-Taiwan Alliance: Who’s in Charge?”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 2 (June 2002), p. 200. 因此在本文當中作者乃將台灣視為是美國在東亞的另一種類型之「同盟國」（不同於日本與南韓），而美台之間在安全防衛上則是一種特殊的「軍事同盟關係」（不同於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



貳、中國崛起對美國亞洲盟邦及其軍事同盟的 影響邏輯：從經濟到安全的「雙重依賴轉移」

在論及中國崛起對美國之亞洲盟邦及其軍事同盟關係的影響邏輯時，本文認為從演繹的思維方式來說，中國應該面對如下兩個重要的思考：第一、北京必須審視美國之亞洲同盟國與其軍事同盟如何看待與定位中國崛起？第二、北京必須思考採取何種措施以回應美國亞洲盟邦及其軍事同盟對中國崛起的界定與態度？首先在第一個問題方面，本文認為美國、美國亞洲盟邦、以及它們之間的軍事同盟對中國崛起的認知、態度、與反應極可能左右北京將選擇如何回應。進一步而言，若是前兩者將中國在國際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等面向之實力的全面提升完全視爲是「中國威脅」(China's threat)，於是積極修好與補強彼此的同盟關係以因應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各式挑戰與危險，⁵ 則北京將面臨思考應對之道以去除、化解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間任何對中國崛起所實施的負面干擾與措施；北京可能選擇衝突，可能選擇讓步，或可能選擇某種形式的折衷、妥協。相反地，若是前兩者將中國在各方面的進步完全視爲是「中國機會」(Chinese opportunity)，採取不尋求或不積極尋求加強彼此的同盟合作以對北京進行負面的壓抑與反制，而是積極地與北京進行正面的交好與交往，則北京自是無須思考以負面的應對措施回應美國與其亞洲盟邦。再則從事實經驗的

⁵ 根據現實主義學派 (the Realist School or Realism) 之權力平衡理論 (the balance-of-power theory) 所言，當面臨共同的安全威脅時，則國家與國家會尋求結盟以共同保護彼此，因為締結軍事同盟可以帶來更多的力量、資源與利益，用以嚇阻或圍堵具有危險性的對手。而沿著此一邏輯，當共同敵人更加強大與更具威脅時，則國家與國家尋求同盟之建立與強化的動機也隨之更爲加強。參閱：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pp. 197-20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125-126;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8-1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139; Joseph S. Nye,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5), p. 70.



發展看來，在這兩個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光譜之中（視中國崛起為完全的「威脅」 vs. 視中國崛起為完全的「機會」），美國與它的亞洲盟友顯然並不將中國崛起視為是「完全的機會」或「完全的威脅」，而是「既是機會也是威脅」，甚至某種程度上是「威脅多於機會」。⁶ 換言之，也正因為如此，美國與其亞洲盟友一方面維持繼續與中國的交往、合作，另一方面則尋求軍事同盟關係的強化（例如：聯合發展區域飛彈防禦系統、擴大共同安全防衛的地理概念、以及增加、擴大聯合軍事演習等）以因應中國崛起所可能帶來的威脅，於是中國也必須因此而尋求突破該強化後同盟關係所加諸在中國崛起上的限縮與箝制。

若面對第一個問題的思考是成立的，則中國緊接著必須面臨第二個問題：即究竟北京應該採取何種方式以回應美國與其盟友對中國崛起所進行的反制或圍堵措施？就美國與其亞洲盟邦所進行之軍事同盟關係（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的強化而言，由於該行動皆以指向中國的擴軍與其軍事現代化之目標不明確為主，是基於防止中國崛起之可能帶來的安全威脅為最主要考量，因此本文認為就北京做為一個理性的行為者（rational actor）來說，其如果能達成「虛化」或「弱化」，甚至是「裂解」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間所建立起的共同安全與防衛機制（即軍事同盟關係），則此將是北京在戰略利益上的重大勝利，而此當也是北京應當會努力以赴的戰略目標。更進一步來說，第一、對北京最佳的結果是中國既裂解、瓦解美國與其亞洲盟邦的軍事同盟關係，並且「策反」美國的盟友投靠中國而改與北京建立「戰略伙伴關係」，甚至是「軍事同盟關係」；第二、對北京次佳的結果是中國雖未能策反美國的盟友改與中國建立軍事同盟或戰略伙伴關係，但至少達到裂解、瓦解它們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並且促其在美中兩方競爭當中保持中立而不倒向任何一方；第三、對北京再次佳的結果是中國雖未能裂解、瓦解它們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但至少做到弱化或虛化該同盟關係而讓美國的盟邦選擇中立、不做為、或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以上三種可能的結果皆可視為是對中國有利的情況，而這些結果也將

⁶ Minxin Pei, "China's Hedged Acquiescence: Coping with US Hegemony," in Byung-Kook Kim and Anthony Jones eds., *Power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Shifting Strateg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p. 102-105.



某種程度上衝擊東亞的區域秩序並且危及美國在該區域的領導地位。

對北京來說，若「讓美國與其亞洲盟友之間的軍事同盟失效(defunct or not work)」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原則與目標(姑且先不去探究北京能否裂解或瓦解該軍事同盟，亦不去細問北京能否策反美國的亞洲盟友)，則中國基本上可以有列三種因應方式：第一、循著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理論與邏輯，北京可以一方面透過國家內部的力量提升(即以更快速度與更大幅度的整軍經武)，另一方面藉由國家外部的合縱連橫(即尋求與俄羅斯以及中亞各國之戰略伙伴關係的建立)，如此以達到對抗、制衡前述已進行強化之軍事同盟。⁷ 第二、透過中國「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論述的國際宣傳，北京可以消弭美國、美國亞洲盟國、以及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論」的擔心與疑慮，如此以減低美國與其亞洲盟國對崛起中國的敵意，進而達到緩和前述之軍事同盟的再強化。⁸ 第三、善用中國崛起的優勢(尤其是中國持續的經濟成長)，北京可以促成非美國盟邦的亞洲國家以及美國盟邦的亞洲國家，甚至是美國本身形成、擴大對中國之經濟與貿易的依賴，⁹ 而此經貿的依賴關係則包括兩個面向：其一為前述國家之對中國低成本與低價格之貨品的進口依賴(當中國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工廠時)；其二為前述國家之對中國廣大消費市場的出口依賴(當中國成為世界最主要的市場時)。如此，北京將可藉由各國對其經濟的依賴進而發揮槓桿作用(leverage)去影響其他國家在政治外交、軍事安全、氣候變遷、能源與人權等議

⁷ 有關國家如何依循權力平衡理論的邏輯以保障該國家(與同盟國)之安全的文獻，請參閱：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5-126;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68), pp. 3-11.

⁸ 有關中國之所以提出和平崛起的邏輯與對策之文獻，請參閱：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1期(2009年3月)，頁117-118; Yong De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6-214;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18-24;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39-48.

⁹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0.



題上的認知與態度，促其採取與北京相近，甚至是相同的立場與政策。事實上，許多關於亞洲國家之對於中國崛起現象所呈現的反應態度的實證研究皆顯示，亞洲國家（包括美國在亞洲的同盟國）對正在崛起、壯大的中國所採取的態度是相對地交好（engagement）與扈從（bandwagoning），並非傾向於與北京進行衝突（confrontation）與抗衡（balancing），此一研究發現顯然與現實主義以及新現實主義的理論有所違背（即這些國家並非採取權力平衡的思維以圍堵、對抗中國），¹⁰ 而這當中的關鍵即是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成長對許多亞洲國家發揮了影響，甚至是支配；另一方面許多亞洲國家對中國的勞力、貨品、以及市場則是有所需求，甚至是依賴。如此讓北京得以利用其經濟優勢而發揮對中國周遭國家的槓桿作用。

在上述的三種因應方式裡，第一個途徑（持續加速、擴大中國的武力崛起）容易將中國及其戰略伙伴（包括俄羅斯與中亞各國）與美國及其亞洲盟友捲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理論所描繪的軍備競賽（arms races）當中。若是如此，則這樣的情境恐怕只會更加催促美國與其亞洲盟邦去推動深化與強化它們之間的同盟關係，而如此也將距離「讓美國與其亞洲盟友間的軍事同盟失效」此戰略原則與目標更形遙遠。第二個途徑（宣傳中國之和平崛起）或許能鬆懈美國與其亞洲盟邦對中國政經與軍事實力之提升的戒心，進而緩和它們之間的軍事同盟對中國採取反制或圍堵的不友善措施，但是這樣的作法終究不若提供具體的利益（例如：經濟與貿易的利益，甚至是安全防衛的承諾）來得實際且具有吸引力。因此，第三個途徑（善用中國崛起的經濟優勢）會是北京用以對美國亞洲盟邦和它們之間的軍事同盟實施槓桿作用的最佳工具。

本文認為北京利用中國崛起的經濟優勢進而影響美國的亞洲盟邦以及它們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部分乃是源自於自由主義（liberalism）理

¹⁰ 關於此一論點與研究之相關文獻，請參閱：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pp. 50-54; Jae Ho Chung,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82, No. 4 (Winter 2009/2010), pp. 657-675; Steven Chan, "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3 (September 2010), pp. 387-412.



論當中所論及國家可以在許多議題上採取合作的模式，尤其是在經濟事務方面，透過經濟貿易的交流與增長，國家間可以形成互賴、互利、共融與合作，如此以化解歧見，消弭衝突，甚至達成某種程度的國際政治與經濟之整合。而該影響更大部分則是來自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理論當中所揭櫫之「經濟相互依賴」（economic interdependence）、「經濟外溢效果」（economic spill-over effect）、「議題連結」（issue-linkage）的邏輯，即一方面隨著經貿往來的加深與互賴關係的形成，基於打破此關係所必須付出的昂貴代價，國家會減低採取單邊行動的意願，尤其是採取以軍事武力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單邊行動。¹¹ 另一方面由於跨國經貿互賴之加深而外溢（spill over）、牽動（involve）國家在國際政治外交、社會文化流動、全球化等其他方面的行動與思考，產生不同議題與面向之間的連結性（linkage）。因此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互賴關係愈加深的時候，雙方極有可能因此而牽動、改變彼此在政治外交與軍事安全議題上，甚至是其他各方面議題的認知與態度，並且朝向正面的友好、交往、與合作關係而發展。換言之，當經濟相互依賴愈加深，則互賴的雙方在政治外交與軍事安全上之選擇合作的可能性也愈提高。¹² 準此，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如是，則我們可以推論某一國家對另一國家的「依賴」（dependence）關係將更是如此。更進一步地說，當某一國家對另一國家形成強烈的依賴關係時，則前者（依賴國家）必須或被動，或主動地向後者（被依賴國家）示好、交好，並且尋求更大的合作、聯合（alignment）、結盟（coalition）、甚至是軍事同盟（military alliance），因為依賴國家對被依賴國家在經濟利益上具有極大的需求與依賴，不論是低成本與低價格之貨品的進口依賴或廣大消費市場的出口依賴，而這些利益是攸關國家的生存、發展、與安全。¹³ 如此，北京即可以藉由美國亞洲同盟國家對其的經濟依賴（且該依賴超越對美國的經濟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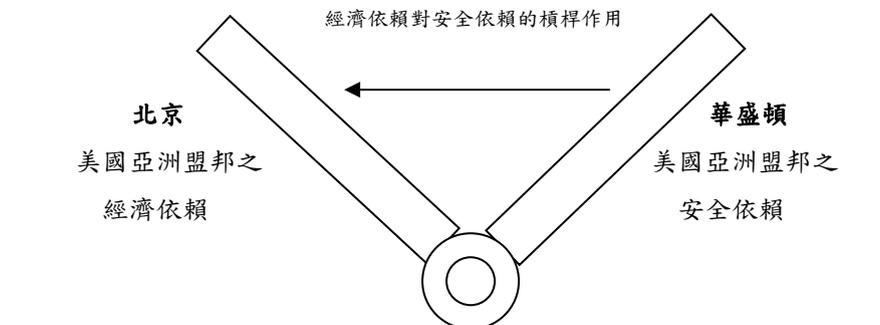
¹¹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p. 40.

¹² James Rosenau,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宋學文, 「議題連結與兩岸關係之研究」, *問題與研究*, 第37卷第2期(1998年2月), 頁26。

¹³ Doug Bandow, "Free Rider: South Korea's Dual Dependence on America," *Cato Policy Analysis*, No. 308 (May 19, 1998), pp. 1-28.



賴)，進而導引至對其的安全依賴（讓該依賴超越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形成本文所謂之「從經濟到安全的『雙重依賴轉移』」），順水推舟地削弱與裂解美國與其亞洲同盟國之間以反制、圍堵中國崛起所建立、強化的軍事同盟關係（參照：圖一）。一旦北京能在經濟以及安全的依賴關係上超越華盛頓，並且提供、滿足美國亞洲同盟國家（也是對中國形成重度依賴的國家）在此兩方面的需求與承諾時，則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間的同盟關係自是沒有存在的必要，而華盛頓的領導地位也將在此一戰略競爭上退出讓予北京。



圖一：從經濟到安全之「雙重依賴轉移」的邏輯

參、美國東北亞三盟邦（日本、南韓、「台灣」）對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的差別回應

固然中國崛起對美國的亞洲盟邦以及他們之間雙邊軍事同盟關係的影響邏輯乃是依循著「先經濟後安全」的「雙重依賴轉移」而進行作用，但在實際操作成效方面此一邏輯與模式未必能對每一個美國的亞洲同盟伙伴以及他們與美國的軍事同盟產生相同程度的影響與後果，也未必每一個美國的亞洲盟邦以及他們與美國的軍事同盟會對中國崛起產生相同的反應與依賴轉移。而在美國的三個東北亞同盟國家當中（日本、南韓、與「台灣」），基本上所呈現的是台灣與「美台同盟」所受到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的作用與影響最為明顯，台



灣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已然形成，而對北京的軍事安全依賴則可能會在未來的數年（2-5年，即2013-2016）內發生，美台之間非正式的軍事同盟關係極有可能逐步走向被中國崛起所削弱與裂解。相對地，日本與美日同盟以及南韓與美韓同盟所受到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的作用與影響則較不明顯。或更進一步地說，在經濟依賴方面，日本與南韓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已在2004至2007年間超越了他們對美國的經濟依賴，但是在安全依賴方面，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則持續走向修好與補強，日、韓兩國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基本上並未受到中國的崛起而削弱與裂解，反倒是更加走向強化和鞏固。之所以造成台灣（「美台同盟」）與日、韓（美日同盟、美韓同盟）在回應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影響上的差別，本文認為其關鍵有二：第一是前者較後兩者在血緣、文化、與認同上與中國更為接近，與中國保有特殊的關係，此接近與特殊關係則有利於從經濟依賴過渡到安全依賴之「雙重依賴轉移」的發展。第二則是來自於台灣內部執政黨（國民黨）的執政理念與政策推動，由於國民黨的理念與政策是與中國進行大幅度與全面性的交往，此亦有助於從經濟到安全之「雙重依賴轉移」的發生。茲就台灣與日、韓對中國崛起「雙重依賴轉移」之影響的差別回應論述於後。

一、日、韓對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影響邏輯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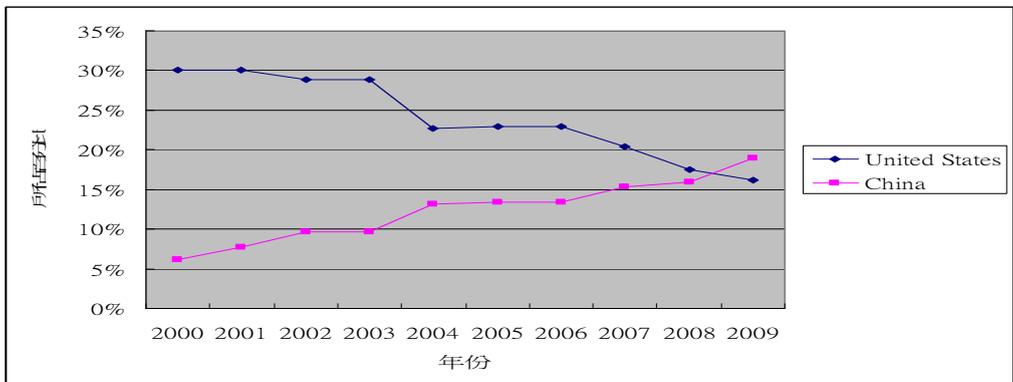
分裂式的依賴（Divergent Dependence）

中國崛起對日本（美日同盟）與南韓（美韓同盟）的衝擊主要是來自日、韓雙方與中國的經濟互賴與貿易流量之增加，並且是與中國的經貿互賴關係超越、取代與美國的經貿互賴關係。換言之，即中國在日本與南韓兩國的對外貿易上，其重要性超越、取代美國在日、韓兩國的對外貿易之重要地位。但是中國崛起所帶動的經貿重要性之超越（超越美國）卻並未轉換成經濟互賴關係中的「經濟外溢效果」，進而導引出兩國在軍事安全上從「依賴美國」走向「依賴中國」的「安



全依賴轉移」，雖然兩國都對漸壯大的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愈發感到不可忽視。也因為如此，日、韓兩國則呈現「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的「分裂式依賴」(divergent dependence)。

首先，在日本最主要的出口貿易國部分，中國於 2009 年超越、取代美國成為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國家，中國從原來 2000 年佔日本總出口的 6.20% 到 2009 年佔日本總出口的 18.90%，其佔有比例增加三倍之多。反觀美國佔日本總出口之比例則從原來 2000 年佔日本總出口的 30% 下降到 2009 年佔日本總出口的 16.12%，其佔有比例則下滑了近五成（參照：圖二）。相似的情形也出現在日本最主要的進口貿易國部分，中國於 2002 年即超越、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最主要的進口國家，中國從原來 2000 年佔日本總進口的 14.50% 到 2009 年佔日本總進口的 22.21%，其佔有比例增加 53.17%。反觀美國佔日本總進口的比例則從原來 2000 年佔日本總進口的 19% 下降到 2009 年佔日本總進口的 10.70%，其佔有比例下滑了 14.68%（參照：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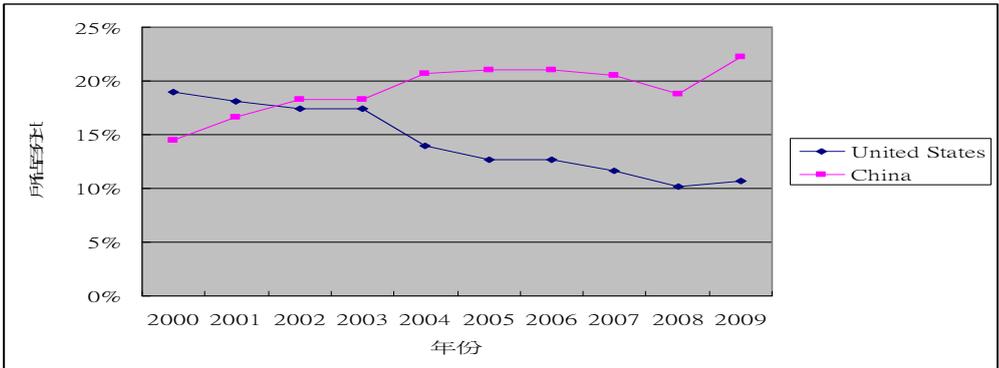
圖二：2000-2009 年美國與中國在日本最主要的出口國家中的變化

參考資料：2000-2007 年部分取自：Strategic Asia:

<http://strategicasia.nbr.org/Data/DataSheet/DisplaySheet.aspx?y=11+12+13+14+15+16+17+18&c=11+18+34+36+40&i=303+304+305+306+317&t=&r=>

2008-2009 年部分取自：Exports by Principal Country of Destination at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http://www.stat.go.jp/data/nenkan/zuhyou/y1501000.xls>.





圖三：2000-2009 年美國與中國在日本最主要的進口國家中的變化

參考資料：2000-2007 年部分取自：Strategic As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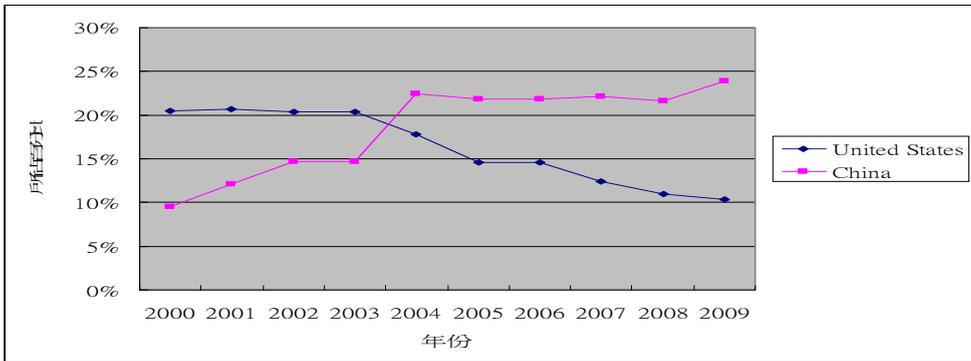
<http://strategicasia.nbr.org/Data/DataSheet/DisplaySheet.aspx?y=11+12+13+14+15+16+17+18&c=11+18+34+36+40&i=303+304+305+306+317&t=&r=>

2008-2009 年部分取自：Imports by Principal Country of Origin at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http://www.stat.go.jp/data/nenkan/zuhyou/y1502000.xls>.

其次，在南韓最主要的出口貿易國部分，中國於 2004 年超越、取代美國成為南韓最主要的出口國家，中國從原來 2000 年佔南韓總出口的 9.50% 到 2009 年佔南韓總出口的 23.85%，其佔有比例增加二點五倍之多。反觀美國佔南韓總出口比例則從原來 2000 年佔南韓總出口的 21.50% 下降到 2009 年佔南韓總出口的 10.36%，其佔有比例則下滑了近五成（參照：圖四）。相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南韓最主要的進口貿易國部分，中國於 2005 年即超越、取代美國成為南韓的最主要的進口國家，中國從原來 2000 年佔南韓總進口的 7.40% 到 2009 年佔南韓總進口的 16.79%，其佔有比例增加 127%。反觀美國佔南韓總進口的比例則從原來 2000 年佔南韓總進口的 21% 下降到 2009 年佔南韓總進口的 8.99%，其佔有比例則下滑了將近六成（參照：圖五）。以上的敘述統計總體呈現了一個現象與趨勢，即約在 2000 年代的中期與晚期，不論是在出口部分亦或是進口部分，中國確實已超越，並且取代美國成為日、韓兩國在經濟貿易上的地位與重要性。換言之，「經濟依賴轉移」（從依賴華盛頓轉向依賴北京）確實在東京與首爾兩個案例中發生。



然而很明顯的是，由中國崛起所帶動的日中與日韓的經貿數量之超越日美與韓美的經貿數量卻並無轉換成如經濟互賴理論所言之「經濟外溢效果」，藉由國際貿易上從「依賴美國」轉向「依賴中國」之「經濟依賴轉移」，進而導引出兩國在軍事安全上從「依賴美國」走向「依賴中國」的「安全依賴轉移」。相反地，在華盛頓實踐其「重返亞洲」的政策之下，日本與南韓的軍事同盟關係因此而獲得改善、修補與強化。首先在對中國崛起以及它對東亞區域安全的潛在威脅上，日、韓皆在其官方的政策上明白表示將繼續尋求強化與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以因應中國日益增強的軍事安全威脅。例如：日本首相菅直人於 2011 年 1 月 21 日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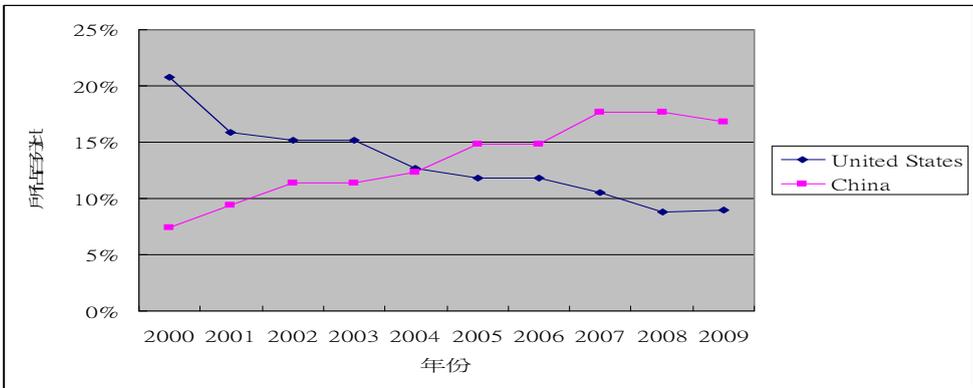
圖四：2000-2009 年美國與中國在南韓最主要的出口國家中的變化
參考資料：2000-2007 年部分取自：Strategic Asia:

<http://strategicasia.nbr.org/Data/DataSheet/DisplaySheet.aspx?y=11+12+13+14+15+16+17+18&c=11+18+34+36+40&i=303+304+305+306+317&t=&r=>.

2008-2009 年部分取自：By Nations Exports and Imports of Statistical Database at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KOSIS):

http://www.kosis.kr/eng/database/database_001000.jsp?listid=R&subtitle=External%20trade.Foreign%20exchange.Balance%20of%20payment.





圖五：2000-2009 年美國與中國在南韓最主要的進口國家中的變化

參考資料：2000-2007 年部分取自：Strategic Asia:

<http://strategicasia.nbr.org/Data/DataSheet/DisplaySheet.aspx?y=11+12+13+14+15+16+17+18&c=11+18+34+36+40&i=303+304+305+306+317&t=&r=>

2008-2009 年部分取自：By Nations Exports and Imports of Statistical Database at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KOSIS):

http://www.kosis.kr/eng/database/database_001000.jsp?listid=R&subtitle=External%20trade.Foreign%20exchange.Balance%20of%20payment

強調日美同盟在維持亞太地區之安定上所扮演重要角色；¹⁴ 日本防衛省則於2010年12月17日所公佈的最新一期的「防衛大綱計畫」(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中表示，日本要重新回到「以美日同盟為基軸」的軌道，且美日雙方皆視彼此為有關於此區域安全穩定的重要伙伴。¹⁵ 而南韓與美國為了回應北韓於2010年3月與11月所對南韓發動的軍事攻擊因此進行了強化彼此軍事同盟的關係與合作，但國際間普遍認為該動作亦是針對中國的崛起而所做出的反應。¹⁶ 另外在具體的軍事行動上，從去年(2010年)夏天開始，美國與其同盟國(包括日、韓兩國)則在此區域進行了一系列的聯合軍事演習。例如：首先是共

¹⁴ 「菅直人：日美同盟維持亞太安定要角」，*自由時報*，2011年1月21日。

¹⁵ 何思慎，「日本新防衛計畫大綱下日、中新安全關係」，*戰略與評估*，第2卷第1期(2011年3月)，頁61。

¹⁶ 蔡增家，「美日韓軍演，演給誰看？」，*中國時報*，2010年12月9日。



有來自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加拿大、與澳大利亞等十四個國家約兩萬名官兵參與演練的「環太平洋演習」（每兩年舉行一次）。其次是在新加坡水域舉行「聯合海上戰備和訓練演習」。接著是七月上旬美國與南韓進行「反潛艇演習」（原先傳聞美國海軍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戰鬥群將進入黃海，後來在中國的強烈反對下而移至日本海舉行）。¹⁷ 八月上旬，美國與其前交戰國家越南首次於南海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八月中旬，美國與南韓再進行第二次聯合軍事演習，其規模是繼南韓海軍天安艦於三月被擊沈後最大的一次；八月下旬，日本媒體報導美國與日本計畫將在十二月份於釣魚台列島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後來因為北韓於十一月下旬向南韓延坪島進行砲擊，華盛頓與首爾於是展開另一波的聯合軍事演習（11月28日至12月1日），而華盛頓與東京接續其後舉行雙方歷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12月3日至12月10日），而同一時間（12月6日）美國國務卿希拉蕊與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及南韓外長金星煥則在華盛頓舉行會談共商因應北韓的威脅。¹⁸ 這一系列的發展皆說明了，雖然中國在經濟貿易上的重要性（對日、韓而言）是超越、取代了美國，然而在安全防衛上的重要性，中國並未超越、取代美國。東京與首爾所呈現的是「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的「分裂式依賴」。

二、台灣對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影響邏輯的回應：

走向匯聚式的依賴（Convergent Dependence）？

相較於日、韓兩國所呈現的經濟依靠中國，安全依靠美國之「分

¹⁷ 「亞太軍演環繞中國周邊舉行，美專家：防備中國等新興勢力崛起」，*中國時報*，2010年7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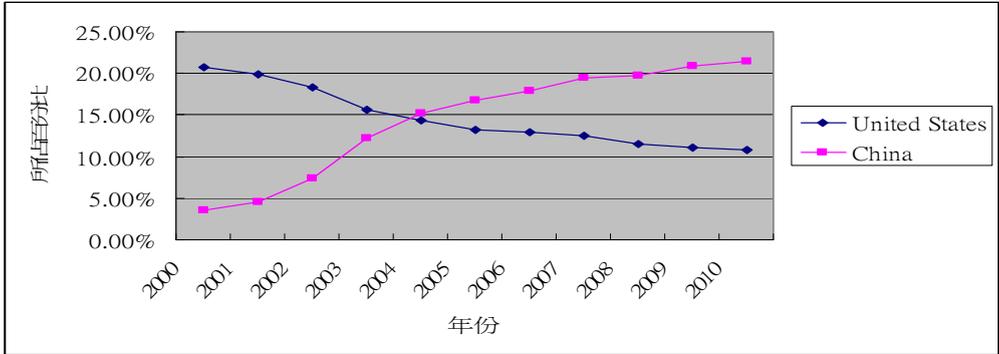
¹⁸ 參照：Remarks with Japanese Foreign Minister Seiji Maehara and South Korean Foreign Minister Kim Sung-hwan: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12/152443.htm> and Trilateral Statement Japan,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0/12/152431.htm> (檢索日期 2010年12月16日)。



裂式依賴」，本文認為台灣目前對中國崛起之從經濟到安全的「雙重依賴轉移」影響邏輯的回應是在經濟上已呈現對中國的依賴大過於對美國的依賴，在安全上則極有可能出現即將由對美國的依賴轉向對中國的依賴，而此一發生的前提是若當前執政的國民黨能於 2012 年繼續執政，並且馬英九總統會在他的第二任內推動繼兩岸的經濟整合之後關於政治整合（兩岸和平協議之簽訂）與軍事安全合作（軍事互信機制之建立）的議題與進程。若是沿此一方向發展，台灣在中國崛起對美國亞洲盟邦的影響與衝擊當中極可能成為「匯聚式的依賴」(convergent dependence)，即台灣「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在安全上也依賴中國，兩者皆不再依賴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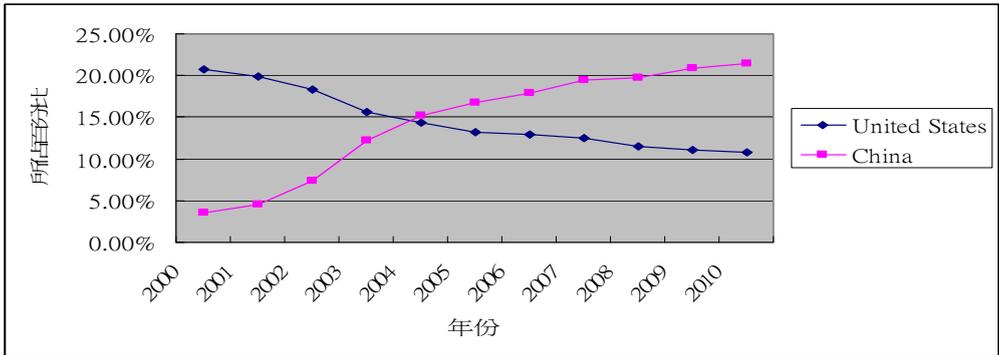
在經濟依賴的轉移方面（從華盛頓轉向北京），首先，在台灣最主要的出口貿易國部分，中國於 2004 年超越、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國家，中國從原來 2000 年佔台灣總出口的 3.62% 到 2010 年佔台灣總出口的 21.47%，其佔有比例增加將近六倍之多。反觀美國佔台灣總出口的比例則從原來 2000 年佔台灣總出口的 20.79% 下降到 2010 年佔台灣總出口的 10.81%，其佔有比例下滑了近五成（參照：圖六）。其次，相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台灣最主要的進口貿易國部分，中國於 2004 年即超越、取代美國成為台灣的最主要的進口國家，中國從原來 2000 年佔台灣總進口的 3.62% 到 2010 年佔台灣總進口的 21.47%，其佔有比例增加六倍。反觀美國佔台灣總進口的比例則從原來 2000 年佔台灣總進口的 20.79% 下降到 2010 年佔台灣總進口的 10.81%，其佔有比例下滑了 50%（參照：圖七）。以上的統計結果基本上也呈現了一個總體現象與趨勢，即約在 2000 年代的中期，不論是在出口部分亦或是進口部分，中國確實已超越，並且取代美國成為台灣在經濟貿易上的地位與重要性。換言之，「經濟依賴轉移」（從依賴華盛頓轉向依賴北京）確實已在台北的身上發生。而台灣於 2010 年 6 月與中國所簽訂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即可視為是台灣對中國經濟崛起之「工廠與市場」之角色與重要性的重視，同時也是針對此一經濟依賴結構之轉變而所建立起的規範與框架（當然台灣也同時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積極尋求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





圖六：2000-2010 年美國與中國在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國家中所佔百分比之變化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
<http://cus93.trade.gov.tw/fsci/>.



圖七：2000-2010 年美國與中國在台灣最主要的進口國家中所佔百分比之變化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中華民國進出口貿易統計：
<http://cus93.trade.gov.tw/fsci/>.

然而與日、韓兩國很大不同之處乃是台灣在經濟依賴轉移產生之後是極有可能跟隨著發生政治與軍事安全依賴的轉移（日、韓在經濟依賴轉移發生後並未出現安全依賴轉移），甚至對後兩者的觀察、爭論與預期早在台灣的經濟依賴轉移發生之前與同時即已出現。而這樣的潛在可能一方面除了北京可以藉用台灣對其經濟的依賴而發揮槓桿作



用之外，另一方面則是與執政的國民黨之全面地推動與中國修好、交往和合作有關，而如此全面地與中國修好、交往和合作則又若干程度地削弱美國對台灣以及「美台同盟」雙方在政治與軍事安全上的信任與合作。國民黨執政下的台灣與中國皆認為雙方除了全面、大幅地在經貿、社會、文化等領域進行交流交往外，沿著「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雙方也都非常積極地規劃在「低階政治」(low politics)的議題完成之後步入具有濃厚「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色彩的議題，即政治與軍事安全議題。其中政治的議題則是以兩岸「和平協議」(peace agreement)的簽訂為最主要的目標，因為這也是海峽兩岸（尤其是台灣）所最希冀達到的目標—追求和平與消除戰爭。而政治目的（台灣海峽的和平）的到達則牽動台灣與中國雙方在軍事上必須也發展出若干形式的機制以配合，而建立起海峽兩岸雙方的軍事互信機制（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於是也成為雙方在軍事安全上重要的課題。

從以上議題的進程來看（先經濟，後政治與安全），台灣受中國崛起的影響的確是相對明顯地順著先「經濟依賴轉移」，後「安全依賴轉移」的路徑而發展，因為就安全防衛上而言，中國不需依賴台灣在安全上提供保護與承諾，反而是台灣必須向中國在安全上做出妥協，甚至是爭取中國對台灣在安全上的承諾。準此，台灣在安全依賴轉移上倒向中國也就順理成章。而為達成上述台海和平的政治目標，海峽雙方必須向對方釋放善意，但弔詭地是雙方過於急促、熱絡的修好與交往，以及交往的進程推進過於向前則反而減低、削弱美國在台海的影響力，甚至是損及美國的利益。例如：在政治方面，國民黨的重新執政即讓台灣回到「一個中國」的原則（此與民進黨執政時期所走的「一中一台」路線明顯不同），如此卻讓美國在兩岸之間逐漸形成的政治默契與共識（一個中國）當中失去牽制任何一方的空間。而在軍事安全方面，在野時的國民黨多次對美國對台軍售進行杯葛，而重新執政之後亦未能充分改善美台軍售以維持台海的軍力平衡（當然美方對武器銷售台灣亦多有保留），如此形成美國對國民黨政府主政下的台灣在捍衛台海軍力平衡的決心上有所質疑。對於台北轉向北京尋求安全依靠與承諾的動作，其自然而然地降低「美台同盟」之存在與強化的必要



性，而華盛頓也將必須思考其何需一廂情願地協助台灣進行安全防衛？¹⁹

肆、結論

中國崛起的確是當今國際社會中極為顯著的現象，包括其經濟的快速成長、軍事大幅的現代化、以及國際政治與外交影響力的與日俱增；而中國崛起所帶來對國際體系的衝擊，對周遭鄰國的影響亦是全方位的，既給這些國家帶來機會，也帶來挑戰。本文針對中國崛起對美國的亞洲盟邦以及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所構成的影響邏輯進行探討，在北京回應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間所架起之軍事同盟的多面向策略當中（包括採取權力平衡的方式以進行對抗與制衡，積極宣傳「和平崛起」以緩和各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與質疑，以及利用中國經濟成長的優勢促成他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等），本文認為中國正善用其經濟與貿易上的優勢（尤其是它超越、取代美國的地位與重要性），對美國的亞洲盟邦和美國與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進行槓桿作用以弱化、鬆動、甚至瓦解他們對中國之崛起與發展可形成的限縮與箝制。依循著「先經濟後安全」的軌跡，北京正藉由亞洲各國對其生產與市場的依賴（經濟依賴轉移），逐步導向各國對其安全與防衛的依賴（安全依賴轉移），而形成本文所稱之「雙重依賴轉移」。在此之下，美國與其亞洲盟邦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將因此發生質變，進而被削弱與裂解，而華盛頓在東亞的領導地位也將因此受到北京嚴厲的挑戰。

雖然中國擁有如此以經濟貿易的優勢進而影響美國的亞洲盟友以及美國與它們之間之軍事同盟，但是在實際運作的效果上，此一影響邏輯與模式不必然在每一個美國的亞洲盟友身上發揮作用，或形成相

¹⁹ Charles Glaser 教授即持此一觀點，參照：Charles Glaser,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86-88; and Nancy Bernkopf Tucker, "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Summer 2002), pp. 15-28.



同的影響結果。在三個美國的東北亞同盟國家當中，日本與南韓受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的作用並不完全，雖然在2007年之後中國已全面取代美國成為日、韓的最大出口國家與最大進口國家，但近一年來美日與美韓同盟關係的強化與鞏固則說明了東京與首爾並未因為經濟依賴轉移的發生而出現安全依賴轉移，而是形成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依賴美國的「分裂式依賴」。相對地，台灣則是呼應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作用較為明顯的例子，從台灣與中國交好與交往的發展來看（尤其是台灣在國民黨的主政下），同時審視雙方在議題設定與議程安排上的邏輯與進程，台灣與中國是順著「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與安全」的路徑而向前進行。倘若國民黨於2012年順利繼續執政並且開始推動兩岸之間在政治與軍事安全上的對話、交流、甚至是合作架構的建立（即兩岸和平協議的簽訂與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則台灣會是繼經濟依賴轉移的發生之後，進而出現安全依賴轉移，形成是經濟依賴中國，安全也依賴中國的「匯聚式依賴」，如此也將嚴重衝擊美台之間非正式的軍事同盟關係。

中國運用「先經濟後安全」、「從經濟到安全」的「雙重依賴轉移」影響邏輯與模式是合理的，而其合理乃是始自於中國的崛起，包括經濟成長、軍事現代化、以及北京在國際間政治外交影響力的提升。準此，本文認為對美國而言，源自中國崛起所產生之從經濟到安全的「雙重依賴轉移」影響模式將不易為華盛頓所改變，除非中國在經濟與貿易上的優勢重新為美國所超越與取代，而美國則以同一影響邏輯與模式將經濟與安全的「雙重依賴」皆導向華盛頓。若從經濟到安全之「雙重依賴轉移」影響模式是中國崛起的戰略邏輯，而許多事實的數據也都呈現美國在經濟依賴上的重要性不若中國，則（1）如何力挽美國的亞洲盟邦至少在安全依賴上不要倒向中國？（2）如何避免美國與亞洲盟邦之間的同盟關係不要出現鬆動、弱化、甚至瓦解？此兩個問題會是華盛頓面對上述影響邏輯與模式的重要思考。而在落實於美國與其三個東北亞重要之安全同盟伙伴當中，很明顯地，華盛頓已對其與東京及首爾的同盟關係進行了強化與鞏固的措施，因為如果不如此做而恣意讓美日與美韓同盟關係出現鬆動、弱化與瓦解，讓日、韓兩國倒向北京而尋求中國的安全保障與承諾，此將形同宣告美國在東亞地區



的領導地位是讓出給與了中國。然而華盛頓對台北若干可能呼應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影響模式的動作則在對台灣的安全防衛上顯得躊躇猶豫而立場不定，其中又以對台軍售的問題而有許多保留。雖說華盛頓多次強調不會忽視台灣的自由、人權與民主，然而對於近兩年來美國外交圈所出現因台灣可能走向「芬蘭化」(Finlandization)的質疑，而主張讓台灣自由地選擇其安全依靠對象(中國)的聲音，²⁰台北不得不思考其呼應中國崛起之「雙重依賴轉移」影響模式所可能必須承擔的成本與後果(即失去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承諾與保障)。當然，若真地讓台北出現完全的安全依賴轉移，改而尋求北京的安全承諾與保障，則華盛頓也必須認真思考其所必須承擔的成本與後果是什麼？

²⁰ Bruce Gilley, "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0), pp. 44-60.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何思慎，「日本新防衛計畫大綱下日、中新安全關係」，**戰略與評估**，第2卷，第1期(2011年3月)，頁51-68。
- 宋學文，「議題聯結與兩岸關係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2期(1998年2月)，頁21-35。
- 陳亮智，「尋找解釋美中戰略競爭的驅動力量：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或是權力轉移？」，**中國大陸研究**，第52卷，第1期(2009年3月)，頁87-128。
- 蔡增家，「美日韓軍演，演給誰看？」，**中國時報**，2010年12月9日。
- 「菅直人：日美同盟維持亞太安定要角」，**自由時報**，2011年1月21日。
- 「亞太軍演環繞中國周邊舉行，美專家：防備中國等新興勢力崛起」，**中國時報**，2010年7月5日。

二、英文部分

- Bandow, Doug, "Free Rider: South Korea's Dual Dependence on America," *Cato Policy Analysis*, No. 308 (May 19, 1998), pp. 1-28.
- Chan, Steven, "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2, No. 3 (September 2010), pp. 387-412.
- Chung, Jae Ho, "East Asia Responds to the Rise of China: Patterns and Variations," *Pacific Affairs*, Vol. 82, No. 4 (Winter 2009/2010), pp. 657-675.
- Deng, Yong, "Reputation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China Reacts to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86-214.
- Gilley, Bruce, "Not So Dire Straits How the Finlandization of Taiwan Benefits U.S.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0), pp. 44-60.
- Glaser, Charles, "Will China's Rise Lead to War? Why Realism Does Not Mean Pessimism,"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March/April 2011), pp. 80-91.
- Kang, David,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andler, Mark, "Offering to Aid Talks, U.S. Challenges China on Disputed Island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0.
- Landler, Mark and Sewell Chan, "Taking Harder Stance Toward China, Obama Lines Up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2010.
- Liska, George,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68).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 Nye, Joseph S. Jr.,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5).
- Pei, Minxin, "China's Hedged Acquiescence: Coping with US Hegemony," in Byung-Kook Kim and Anthony Jones eds., *Power and Security in Northeast Asia: Shifting Strateg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pp. 99-125.
- Rosenau, James,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 Tkacik, John J. Jr., "The U.S.-Taiwan Alliance: Who's in Charge?" *Issues & Studies*, Vol. 38, No. 2 (June 2002), pp. 200-212.
- Tucker, Nancy Bernkopf, "If Taiwan Chooses Unification,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ar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5, No. 3



(Summer 2002), pp. 15-28.

Walt, Stephen M.,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Walt, Stephen 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No. 110 (Spring 1998).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39-48.

Zheng, Bijian, "China's 'Peaceful Rise' to Great-Power Status,"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5), pp. 8-24.

